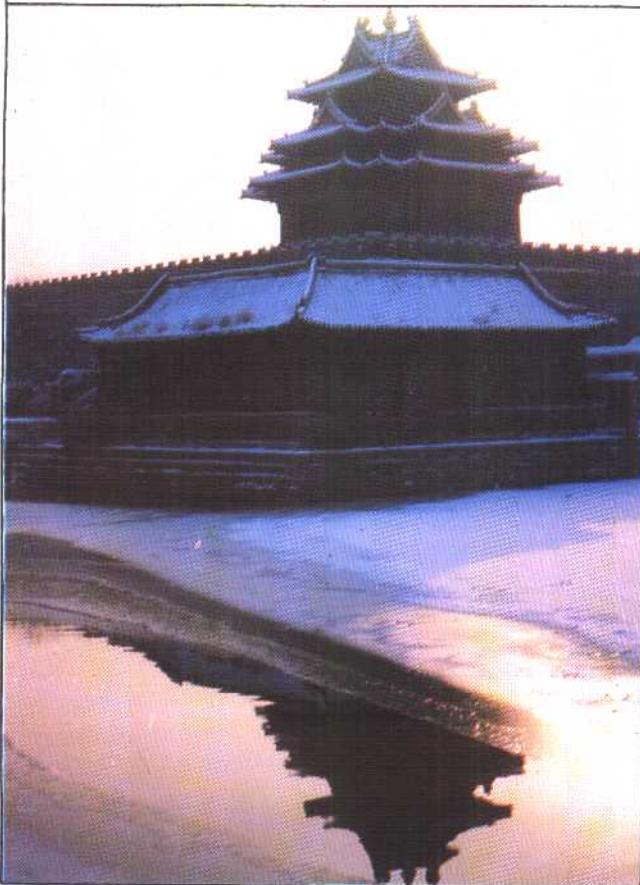


- 元詩選瑣談 顧廷龍 陳先行
- 岑仲勉史學論文集讀後 朱金城
- 我讀中華書局收藏 現代名人書信手迹 沈鵬
- 古籍校點釋例(初稿)

中華書局・SHUPIN



書
是
年
四

4

1991



王興虎先生為《書品》而作。

書 品 第四期 1991年12月出版

主編 趙守儼

中華書局總編輯辦公室編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郵政編碼：1007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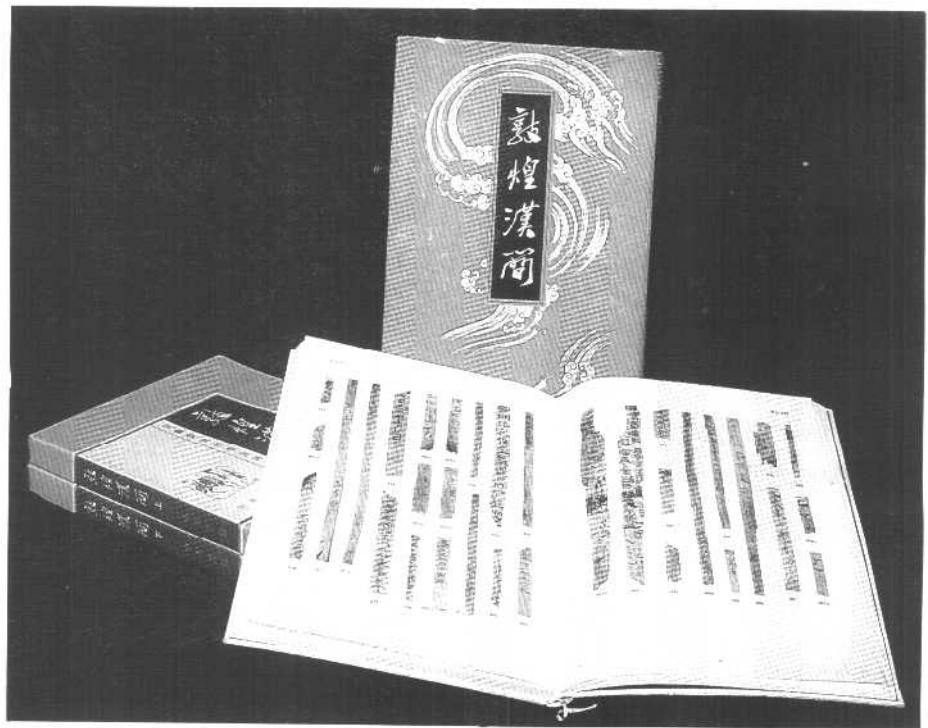
中華書局出版

文物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國內統一刊號CN11-1357



定價 1.50元



敦煌漢簡自首次問世至今已歷八十余年，共出土二千四百八十余枚。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據此編成《敦煌漢簡》一書。該書包括圖版、摹本、釋文、簡牘編號索引、敦煌馬圈灣漢代烽隧遺址發掘報告五個部分。該書的編輯出版，為研究兩漢時期的社會、政治、經濟和軍事提供了方便。上圖為該書書影。

一九九二年《書品》

一九九一年《書品》合訂本

徵 訂 預 告

《書品》是由中華書局編輯出版的，以評論和介紹本版圖書為主要內容的書評刊物，自一九八六年創刊，至今已出版了六年，在學術界、評論界、圖書館界和古籍整理界引起了一定的反響，得到了海內外讀者的支持和好評。《書品》除刊登由專家、學者撰寫的書評文章外，每期還刊出介紹國內外圖書館收藏漢籍的文章及介紹古籍常識的文章，以豐富刊物的內容，更好地為讀者服務。

《書品》服務的對象為學術界、評論界、圖書館界和古籍整理界。一九九二年，《書品》仍將以其特有的風格，繼續為各界讀者服務。一年出版四期，季末出版。每期酌收工本費 1.50 元，外加郵費 0.30 元，全年共計 7.20 元。

另一九九一年《書品》合訂本定價 10 元，凡由我局郵購訂閱者，一律八折優惠，即收 8 元，外加郵費 0.30 元（合訂本數量有限，欲訂從速）。

凡欲訂閱的單位和個人，請與中華書局讀者服務部聯繫，辦理訂閱事宜。地址：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郵政編碼：100710。開戶銀行：北京工商銀行王府井分理處。帳號：661092～43。歡迎訂閱。

中華書局總編輯辦公室

書 目 錄

1991年第四期
(總第24期)

- 《元詩選》瑣談 顧廷龍 陳先行 (2)
- 讀《王文韶日記》 鄧雲鄉 (10)
- 《岑仲勉史學論文集》讀後 朱金城 (20)
- 讀《中國與非洲》有感 宋 峴 (26)
- 談“年譜叢刊”的整理出版 李 岩 (31)
- 史料鈎沈與書法欣賞
——我讀《中華書局收藏現代名人書信手迹》... 沈 鵬 (34)
- 中華分工出版古籍的一段故事 胡道靜 (38)

- 英國圖書館之中文特藏
..... [英]弗朗西絲·伍德 劉詠聰 鄭德華譯 (41)

- 古籍小常識 崔文印:古籍的幾種主要裝訂形式 (46)

- 中華書局近期書目 (48)

- 一九九一年《書品》總目錄 (51)

- 古籍校點釋例(初稿) (68)

封面攝影:胡 鏞 封面設計:王增寅
封面照片:故宮角樓

今元詩選

瑣談

顧廷龍

陳先行

“網羅遺失更增刪，一代才華孰可攀；猶彷中州舊時例，瓣香端合重遺山。”這首詩為玉蘭堂後人文點所作，可說是代表了清代文學界對顧嗣立與《元詩選》的評價。

顧嗣立（1665—1722），字俠君，一字心堅，別號奇庵，江蘇長洲人。博學工詩，享有盛名。家居蘇州城內，構有草堂，取東坡《獨樂園》句，顏曰“秀野”，招邀四方賓朋，時舉文宴，一時朝野名士、文彥碩儒莫不與之交遊。康熙三十九年（1700）乙榜中式。玄燁兩次南巡，均被召見。尋由江蘇巡撫宋犖推薦，進京分纂《宋金元明四朝詩》、《皇輿全覽》諸書。五十一年（1712）特賜進士，由補內閣中書舍人改授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兩年以後，又受命入值武英殿纂輯《鳥獸蟲魚廣義》，旋因病告假返里。一生著術甚豐，傳世有《昌黎先生詩集注》、《溫飛卿詩集校注》、《閻邱辨闕》、《詩林韶濩》、《秀埜草堂詩集》、《春樹閑草》、《寒廳詩話》、《自訂年譜》等，而最具影響者，當推其一生精力所萃之《元詩選》。

元代雖有國八十餘年，但文壇活躍，詩歌創作，每變遞進，奇材益出，無論質量數量，都不讓前代。然迨至清初，史傳所載諸集很多散佚不存；元、明人之元詩輯本雖有流傳，但或僅選輯秀句名篇，或因搜訪不力而挂一漏萬，或局限門戶之見而範圍狹窄，均不足有元一代詩歌之徵。秀野先生嘗謂：“詩本天籟，人藉以道性情，歷千百劫，光景常新。自明人倡謂唐以後無詩，歐陽、蘇、陸，概從芟蘚，又何論乎大德、元貞以還，暨至顧瑛、楊鐵崖諸君子哉？”因而決心搜羅元人詩集，匯輯成編，以傳後世。他憑借自己的廣泛交遊，搜遍東南故家所藏，得獲元人專集百家，選詩數萬首，仿元好問《中州集》之例，以天干甲至癸十集分編，凡有別集可據者選成八集，方外、閨秀自為一集，而將諸家選本止存四五首者及從山經地志、稗官野史

輯佚所得另編癸集附後，於康熙三十一年（1692）刻成《元詩選》（由於癸集所收面廣量大，一時不易採摭完備，未及時刊行）。後人習慣上稱是刻為“初集”，這是相對以後所刻二集、三集而言，原書並無初集之名。相反，由於是刻所收較之前人元詩選本在數量上無慮增加數十百倍，他認為雖或有疏漏，但元人別集之搜羅已基本大備，從而得出：“元詩姓名見於各選本者四百餘人，其專集刊行於世百家而已”的結論（見《凡例》），故明確將此書又定名為《元百家詩集》，并在奏呈康熙皇帝時，特別強調“此是元朝一代之詩，向無刻本”（見《自編年譜》）。他當時並沒想到元詩別集存世尚多，將來會有續刻。

人們不禁要問：既如所述，又何以解釋該書總目錄注有“先編百家，全集續出”八字呢？這正是本文接着要談的《元詩選》版本問題。

《元詩選》初、二集的版本

《元詩選》初集的初印本可能已少留存，現在所見到注有“先編百家，全集續出”者均為後印本。只要細審，不難發現“先編”兩字有剜改痕迹，且其字體稍大於“百家”等字。由於未見初印本，無法斷定原刻文字。但據二、三集的總目錄均注有“共計百家，全集續出”兩語來分析，很可能原刻文字亦為“共計”兩字。按理“共計百家，全集續出”也說得通，沒有剜改的必要，但秀野先生當時本無續編的打算，因此實際上原刻僅有“共計百家”四字，與書名《元百家詩集》相呼應。直至後來因編二集，方對重印的初集進行剜改增刻，以免前後矛盾。上海圖書館藏有一部後印本，封面（即書名頁）已改為“秀野草堂元詩選”，而不是“元百家詩集”，并在封面上鈐有“先編百家，全集續出”的印記，則改得更為徹底，亦更加說明秀野先生當初與後來的想法是不同的。由於初集的編纂準備充分，體例嚴謹，而所採多為別集全稿，故初、後印本在內容上無大出入。然而二集的情況就不一樣了。

秀野先生得朱彝尊幫助而於康熙四十一年（1702）刻成《元詩

選二集》，又因應召入京參加編纂《宋元明清四朝詩》得以獲觀內府藏書，而於康熙五十九年（1720）刻成《元詩選三集》，這雖是他始料所未及，却不負其辛勤搜集、鍥而不舍的一片苦心，可謂冥冥之中若有神助。但須注意，他在編二、三集時，體例上作了變動。最明顯的是，初集除總目錄外，自甲至壬各集均有分目錄，并注明每個作者各收詩若干首，而二、三集則取消了分目錄。究其原因，一是受到編纂時間、條件（包括人力、物力）的限制，顯得倉促，不如編纂初集那樣從容不迫；二是他對是否將元人別集搜全、所見者是否係善本或足本感到沒有把握，甚至有的版本明知不理想，祇是一時未獲佳本，姑且用之。這兩點在其自序中亦隱約提及。他似乎已預料或準備將來着手重訂。而事實上，《元詩選二集》正是有初刻本與增補刻本的異同。

將二集的初印本後印本作比勘，即可看出後印本對三十四家做了增補，依次為：仇遠五首（龍曾見仇氏手寫詩卷，即據此入選），白珽七首，錢選十一首，趙文八首，姚樞二首，王磬四首，楊果二首，李思衍十三首，郭昂一首，姚燧六首，李志魯翀三首，李孟三首，鮮于樞七首，小雲石海涯四首，鄧文原八首，元明善四首，李京三首，文矩一首，何失二首，傅若金九首，李洞二首，韓性七首，甘立四首，伯顏八首，蘇天爵一首，徐舫七首，朱希晦一首，吳志淳二首，楊翮三首，丘處機二十八首，吳全節二首，薛玄曠五首，祖銘三首，大圭八首。

這種大規模的增補，自然不能排除秀野先生可能對選詩標準作修改的因素，即補選了原來擯棄的詩作，但更主要的是他後來得到了這些詩集的善本與足本，從而對原刻本進行修訂，使之臻於完善。其中丘處機一家最能說明問題，初刻本以《長春子稿》為底本，僅錄詩九首，而增補刻本以《蟠溪集》為底本，一下子增補了《題劉節使所藏顯宗御畫莊子像》以下凡二十八首，并在提要中補入“有《蟠溪集》六卷”一語。由於他未留下片言隻字，我們不知增刻的確切時間，但估計是在其垂暮之年編刻三集的前後。三集刻成後之兩年他即謝世，不及對三集進行修訂，因而三集沒有版本異同。

《元詩選癸集》稿本

秀野先生雖然專精畢力編刻了《元詩選》初、二、三集，但終因病貧交困，尚有三件事未能做成，一是癸集雖已編成，但未竟刊刻之業；一是三集之外所得六十餘家專集未及編定付梓。

約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前後，有南沙席氏世臣者，從秀野先生曾孫顧果庭處訪得癸集已刻之版及未刻之稿，“爰與果庭乃復細校，勘其脫落，重加修訂”，果庭與世臣誼篤中表，故盡力為之。前後十易寒暑，終於嘉慶三年（1798）刻印成書。但由於此書印本不多，流傳很少，通常所見，多為光緒十四年（1888）席世臣曾孫威之補版重印本。

值得介紹的是，上海圖書館珍藏着《元詩選》癸集稿本與未刻稿本，係顧廷龍、潘景鄭在解放初發現於蘇州文學山房，以重價購得，粉粹“四人幫”後捐獻公家。其中癸集稿本在一定程度上可校刻本之誤。該稿本曾經王氏淵雅堂、潘氏桐西書屋及費氏歸牧盦遞藏，書面及標簽為潘介繁手題：“《元詩選癸集》，秀埜草堂原稿本，六十六冊。”另有費念慈所題書簽：“《元詩選癸集》十六卷，秀埜草堂原稿本，六十六冊。”副頁有王芑孫題跋三首。其嘉慶十一年（1806）跋云：

“嘉慶十有一年冬重遊邗上，携小子嘉福以歸。有坊客述婁東士友願贈此書，求易《淵雅堂集》二部，因而得之，不啻一羊之皮，換千狐之腋，堯可知也。雖然，此秀埜生平辛苦所在，未及付刊。余鄉里後進宜為昔賢完此未竟之業，而漸衰乏力，匪獨搜羅增廣有未能，即照本付梓，亦力有不逮，轉添出一重心事矣。”

又跋云：

“風雨柴門，還家祭竈，忽得此書，了不索價，豈區區夙生緣契攸存，抑先賢從天上修文之暇，未忘遺業，欲托付其人，乃詒余而責之使為究竟其業耶？慨息書之，以待異時論定。第恐精衰力乏，又成負負耳。”

越四年又加一跋，略云：

“此元詩四集，青浦席氏已有雕版。然席鄙陋村俗之夫耳，其刻書意在求利，匪惟刊校不精，妄多刪替，其書迄不行於世，雖登版而所印無多，猶之乎未刻也。然則此一原稿有不可廢，今藏吾家，題記示後。異日有緣者遇之，不可以席氏有刻而遂忽之矣！”

稿本版格用木活字排版墨印，版心上端印“元詩選癸集”，下端印“秀埜草堂”，半頁十行，行十九字，書中“弘”字缺筆，“顚”、“琰”等字均不避諱，可知抄寫於乾隆年間。書中夾簽小紙，或注“原空”，或注“原有某句”，說明此書係秀野先生後人從以前的稿本傳抄而出，視爲稿本，未嘗不可。但由於此本脫字往往僅作標識而未有添補，錯字亦較多，而席氏刻本均已改正；又有與刻本不同處而此本爲勝者，則席氏從果庭處所得之底本當與此本不同，可知癸集在編纂過程中不止一種稿本流傳，而稱此本爲“原稿本”，似稍嫌勉強。

稿本與刻本文字既有出入，互有優劣，茲將稿本可校補刻本者作簡要介紹：癸之甲，稿本多呂起獻《四時讀書樂》四首；癸之戊下，稿本多程養全《慶吳閑閑宗師雙目失明》一首；癸之辛上，稿本多周南《虎邱次和邾進士仲誼韵》一首；癸之壬上，稿本多梅花尼一家《咏梅花》一首；癸之壬下，稿本多《題魏生圖屏》、《簡約魏生》、《生負期醉卧戲題練裙》三首，劉燕歌一家《有感》一首，李飛仙一家《與客遊樂》一首，清遠居士《紀瀛國公詩》一首，佚名《真武道院詩》一首，佚名《水仙祠詩》一首，佚名《琵琶亭詩》一首，佚名《江南譜》一首；癸之癸上，稿本多韓中村《岳王墓》一首，鄧元宏一家《宮詞》一首，張彥高一家《古行路難》一首，李誠泉一家《寓洪中秋玩月》一首；癸之癸下，稿本多劉廉一家《歌風台》一首。此外，稿本可校刻本誤字者尚多，不一一例舉。

應當指出，刻本“癸集之丁”有一百六十六家爲稿本所缺，而稿本有十八家爲刻本所無。這十八家姓氏爲：

胡提舉欽 吳編修炳 孟總管淳 牆東先生陸文圭 葉婺州
衡 鹭海詩人達溥化 清白先生拜楊鑑 楊檢校鑄 劉左司仁本
沈處士性 葛縣尹元喆 王祭酒思誠 施處士鈞 段提舉祐
王博士沂 紫芝生俞和 陸鄉貢景龍 岐山先生魯淵

以上存缺，問題出在稿本。因為根據《元詩選》的編例，凡入癸集者，均出自諸家選本及山經地志、野史稗官、書畫卷軸之輯佚所得，這些人既無專集，存詩又僅數首，然而胡叔等十八家皆有專集（見下文），且各收詩十至六十首不等，當不屬癸集收錄範圍。這就存在兩種可能，一是稿本因所據底本面目不清而抄錯。這種可能完全存在，如癸之己下又誤入癸之庚下文若至嚴恭三十二人，也證明其所據底本的混亂。再就是稿本本身在流傳中發生散失，後人將此十八家抄入以補其缺。那麼該十八家又是怎麼一回事呢？這可從《元詩選》未刻稿本中找到答案。

《元詩選》未刻稿本

《元詩選》未刻稿本兩冊，書面題“元詩選丁集”，係費念慈手筆。此乃康熙間秀野草堂原寫待刻樣本，半頁十三行，行二十三字，書口均題有所收各家別集名，款式字體與初、二、三集一律。凡二十六家，目錄如下：

胡提舉秋伯友集 吳編修炳彥輝集 孟總管淳能靜集 牆東先生陸文圭牆東類稿 葉婺州衡芝陽山人集 龐海詩人達溥化龐海詩人集 清白先生楊鑑楊檢校鑄清白集 劉左司仁本羽庭詩稿

沈處士性白誠集 葛縣升元皓文貞先生遺稿 王祭酒思誠致道集 施處士鈞飲冰餘味集 段提舉天祐吉甫集 王博士沂師曾集

紫芝生俞和紫芝生集 岐山先生魯淵岐山集 陸鄉貢景龍德陽集 陳宣慰祐節齋集 辛判官敬好禮集 龍提舉仁夫麟洲先生集

觀夢道人邾經玩齋集 東海生阮孝思東海生集 教授買闇兼善集 盛公子彧歸胡岡集 復元禪師自恢復元集 雪山禪師文信雪山集

該未刻稿舊藏吳趨雷浚，末有葉廷琯、雷浚二跋。葉氏跋云：

“雷君甘溪在吳門得此書，寄示余滬瀆。舊題《顧俠君元詩未刻稿》，詩僅二十五家，無序無目，而字形行款，悉與顧氏原書相同。考顧氏之選元詩，自稱所見四百餘家，然所編分三集，集凡百家，止三百家耳。又每集各以天干十字分卷，而癸字卷三集皆缺。乾隆中有

有力者得其癸字已成之稿，所輯皆無專集之詩，并及殘篇斷句，多至千餘人，遂爲刻附三集之後，洵快事也。此二十五家一册，核其姓名，既非前三集所有；各標專集，又非癸字卷所遺。我意此即三百家外所剩之一百餘家，顧氏編爲四集，寫樣欲刻而未成者。應有數冊，散佚祇存此一册耳。相傳顧氏刻《元詩選》既成，夜夢古衣冠人數百拜謝之。惜四集未刻傳，則此一百餘家不免抱向隅之恨。世事缺陷不全，往往有如此者。今甘溪得此，將毋其幽光不肯竟泯，故出而爲知詩者所遇。其餘樣本，或尚有散見於世者，甘溪其再留意物色，勸有力者得而刻之，以完顧氏未竟之緒焉。行見古衣冠人又將入夢謝之矣。因書數行，以當左券。同治四年乙丑閏夏望後三日吳門葉廷琯。”

雷氏跋云：

“庚申難後，余於故紙堆中得此書，舊題《顧俠君元詩選未刻稿》。檢之，自胡提舉至復元禪師共二十五家。考顧氏選元詩自稱所見四百餘家，而所編分三集，集各百家，止三百家耳。然則顧氏所見元詩固尚有一百餘家未行於代也。此冊雖無序無目，而字形行款悉與顧氏原書同。核其姓名，均非前三集所有。我意此即三百家外所剩之一百餘家，顧氏續編爲四集，寫樣欲刻而未果。應有數冊，散佚僅存此一册耳。余得之，適長沙許雪門太守有叢書之刻，因介陸君袖海歸此冊太守。相傳顧氏選元詩成，夢古衣冠人數百羅拜階下，乃三百家傳而一百餘家不傳，事之有幸不幸，往往如此。而此二十五家，其幽光不肯竟泯，出而爲余所遇，又適遇太守能刻之，行見古衣冠人又將入夢羅拜矣。同治乙丑秋日吳趨雷浚。

須說明二點：一、因《雪山集》殘末半頁，葉、雷二氏未計及之。所缺半頁，顧廷龍據《玉山草堂集》予以補足。二、跋稱未刻稿一冊，現爲兩冊，係費念慈襯紙重裝。

按葉、雷二氏根據字形行款與初一、二、三集同，從而推知此爲續編未刻稿，這是有道理的。但他們逕以爲這是四百家中所剩一百家內容的一部分，該未刻稿爲四集之散佚僅存，則未免武斷。他們誤解了初集凡例中的一段話，秀野先生當時的認識是，雖然各元詩

選本收錄作者達四百餘人，但其中祇有百家刻過專集，并非四百餘人都有專集（見本文前述）。後來雖續刻了二、三集，也並不存在還編有四集百家的概念，因為三集自序明確告訴人們，其所得專集尚未刻者為六十餘家而非百家，則現存未刻稿當是這六十餘家中的一部分。而這部分是否為三集之外續編之散佚僅存，也很難說，因其並未像前三集那樣根據天干分屬小集，從而看不出這六十餘家已如前三集那樣根據一定體例已經編就的迹象，或許除這二十六家外，另三十四家根本還未來得及編選定稿，至少還不到寫樣待刻的地步。回頭再看癸集稿本中的癸之丁十八家，人們已不難明白是從這六十餘家的底稿中抄來。但有一點要指出，其並非抄自該部未刻稿，否則不會祇抄十八家，而且文字與未刻稿也有小異。也就是說，其所據底本僅編至十八家，當早於未刻稿。這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六十餘家的編選定稿過程。當然，未編選定稿者是很難流傳的，因而我們現在能得到這二十六家未刻稿，已屬幸事，可謂神物呵護，楚弓復得矣。

至于費念慈認為未刻稿屬“元詩選丁集”，這是因二、三集皆缺丁集而作的推測。二、三集何以無丁集，不知其詳。但其據初集之例，均已收足百家，因而費氏之見缺乏依據。

縱觀《元詩選》三輯，除癸集輯有二千四百餘家外，初、二、三集所收專集達三百四十家（包括附），加之未刻稿二十六家，其數量相當《四庫全書》所收元人別集一倍以上，致使四庫館臣不得不發出“有元一代之詩，要以此本為巨觀”的感嘆。如今中華書局已排印出版了初、二、三集，我們希望在整理癸集時，能利用稿本校補，并增入未刻稿二十六家，使這部元詩總集能以完整面貌問世，這不僅將贏得士林稱頌，連秀野先生也會含笑拊掌於九泉之下。

讀《王文韶日記》

• 鄧雲鄉 •

我很愛看前人日記，每看完一部就想寫點什麼，可是常常拖延着，還沒來得及寫，又在看第二部了。去冬看中華版《李星沅日記》，看完拖着尚未動筆，不久又拿到山西人民出版社的《退思齋日記》，內容也很豐富，也想寫，還未動筆，又拿到中華的《王文韶日記》，看過之後，覺得是應該寫篇東西。正遇電視臺播放以高陽小說《胡雪岩》故事改編的港臺電視《八月桂花香》，亂七八糟，欺弄觀眾，深感社會上歷史知識太貧乏了。這本是去古未遠的人與事。《王文韶日記》中就有不少地方記到胡雪岩，想着寫文介紹一下這部《日記》，不說別的，就是對於看電視也有好處，不會被那些不學無術、胡亂編造的編劇、導演們愚弄和欺騙了。自然，如有好學認真，忠實藝術，對觀眾負責的編劇、導演，在編、導近代歷史劇之前，看看這部《王文韶日記》，也是大有益處的，一定會使你所編、導的戲，更真實地再現歷史，提高學術水平，或許成為真能顯示中華文化氣氛的作品，這不也很好嗎？比如說清代大官的服飾，什麼時候穿什麼衣服，《清史稿》中《輿服志》雖有記載，而某些具體情況，則遠不如《王文韶日記》中記得詳明。試看光緒六年一年中所記：

“正月戊寅元旦已巳……慈寧宮、太和殿、壽皇殿行禮時刻，服色均同前。”（按照光緒五年元旦所記：“穿蟒袍補褂同時行禮”。光緒二十六年元旦記云：“巳初皇太后昇皇極殿受賀，在皇極門外行禮。朝衣本色貂褂，不帶膝。巳初二刻皇上昇乾清宮受賀，在門內甬道上行禮，蟒袍補褂染貂冠。”光緒二十八年元旦記云：“辰正二刻太后昇皇極殿受賀，皇上率同行禮，巳初二刻皇上昇太和殿受賀，以上均朝衣、朝冠本色貂褂。巳正二刻壽皇殿隨同行禮，蟒袍補

褂。”以上所引，可參閱佐證“服色均同前”四字內容。

“初七日……乾清門外站來回班，是日忌辰，仍穿補褂、掛朝珠。”

“十五日……保和殿賜蒙古王公筵宴，乾清門站出班，穿貂褂不站回班。”

“十九日……換染貂冠、白風毛褂。”

“三十日……換洋灰鼠褂。”

“二月初七日……換銀鼠褂。”

“初八日……換銀鼠袍。”

“二十五日……換氈冠絨領棉袍。”

“三月十二日……換絨冠夾領湖色衫。”

“十七日……換夾袍褂。”

“二十五日……換單褂。”

“二十七日……換單袍。”

“四月十八日……換實地紗袍褂。”

按四月二十日王文韶接旨與董恂、徐桐等爲殿試閱卷官，二十一日記云：“雨。寅正進內，穿朝服。”這朝服不是平時“袍、褂”，而是朝珠、蟒袍、按領（俗名披肩）、高頂朝帽大典禮服。

“二十七日……換芝麻地紗袍、褂。”

“五月初五日……換直徑紗袍褂，即亮紗。”（按原書標點未斷開。）

“廿八日……換葛紗袍、葛絲冠。”

“六月二十日……本年皇上初旬萬壽……本日蒙賞大卷江綢袍、褂料兩卷、帽緯一匣、大小荷包各一對。”六月二十五日記云：“花衣第一日。入對一刻許，卯正散。赴寧壽宮聽戲，戴胎帽，辰初入座。”按清代大臣遇皇太后、皇帝生日，穿蟒袍上朝，謂之“花衣”。只是無披肩、高頂朝帽，以區別於“大典朝衣”。“胎帽”是夏天涼帽。分白羅胎、萬絲胎（藤絲、竹絲所編）兩種。前者配單袍褂、實地紗、芝麻紗袍褂。後者配亮紗、葛紗袍褂。此處所說“胎帽”，即藤絲、竹絲所編之涼帽。

“七月十八日……換亮紗袍、褂。”

“三十日……換麻地紗袍、褂。”

“八月初八日……換實地紗袍、褂。內廷稱亮紗口直徑，實地口單單紗。”

“十八日……換單袍、褂。”

“二十六日……換戴暖帽。”（按暖帽又名“秋帽”，帽沿由緞、絨、氈到羊皮、染貂、貂。）

“九月二十三日……換羊皮冠、黑絨領珍珠皮袍褂。”

“十月朔日……換海龍冠、皮領灰鼠袍、褂。”

“初九日……換白鳳毛袍、褂。”

“十一月朔日……換貂冠、貂褂。”

由貂冠、貂褂直換到葛絲冠、葛紗袍，再由葛紗直換到貂褂。這就是清代官服：皮（大毛、小毛）、棉、夾、單、紗，周而復始的一年的更替。五品以上的官，才能用朝珠，穿貂褂。王文韶这一年是兵部侍郎領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兼戶部管庫，自然要穿貂褂。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各個朝代，各種官吏的服飾、帽子等級別是十分嚴格的。所謂“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所謂“王侯宅第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不瞭解一點歷史上服飾情況，意識不到這點，是讀不懂這些詩句的。

清代官吏服飾級別，除《清史稿·輿服志》外，在《清通志》、《清通典》中及私家著述吳榮光《吾學錄》、載濤、惲寶惠《清末貴族之生活》中均有記載。但所記都是資料性，像《王文韶日記》中所記，那一天換什麼，生活感特強的材料，可以供人想象真實情景的，却不多見。因而感到是十分有趣的，便摘引光緒六年全年的替換官服的記錄，以供參考想象。編歷史戲劇影視，從事形象藝術，雖不能也不必樣樣求真，但多少有點這樣的常識，便不至於“穿冬衣、戴夏帽，顛倒春秋”了。自然，這也還是對認真從事藝術的人着想。對於那些招搖撞騙的人說來，則無所謂了。

王文韶出生於嘉慶，原籍杭州，後仍以杭州為家，咸豐二年，即公歷一八五二年進士。一生宦途得意。自光緒三年充軍機大臣，八